

■新作聚焦

李英报告文学《远方的“雷烨树”》:

让英雄回家 让精神长存

□张 陵

在迎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作家李英倾情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远方的“雷烨树”》,以一部讴歌英雄的优秀作品纪念中华民族解放的雄壮历史。作品中的英雄主人公,不是在战场上与敌寇拼杀冲锋的忠勇战士,而是一位奔走在战火纷飞的前线,报道八路军战士英勇杀敌和人民抗战消息的战地记者。他的名字叫雷烨,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前线记者,冀东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长、组织科科长。在1943年4月的那个春天,他壮烈牺牲于一场反“扫荡”的战斗中,年仅29岁。他牺牲的地方,长着一片银杏树,当地老百姓怀念他,就把这些树叫作“雷烨树”。作家多次走访当年的战地,特别钟情仍然枝繁叶茂的“雷烨树”——英雄不死,魂魄长在。

雷烨的英雄事迹在冀东抗日根据地广为流传,鼓舞着抗日军民斗志和精神,一度掀起学习雷烨同志的热潮。《晋察冀画报》出版雷烨纪念专辑,集中发表了他的51幅摄影作品以及诗文。《晋察冀日报》头版发表了军分区领导的悼念文章,称雷烨用自己的生命,“在抗日史上又写下了光辉的一页”。80多年过去了,当年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雷烨的故事也深藏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作家李英从英雄的家乡浙江金华起步,沿着英雄走过的路,走到延安,走到山西、河北,走到英雄曾经生活战斗过的许许多多地方,访问当年的抗日根据地,挖掘历史真实,寻找英雄感人的故事。在“雷烨树”这片山林里,作家感慨万千,把历史与现实连接起来,完成了作品的构思,凝聚起飘散在历史时空的英雄灵魂,升华起英雄的文学形象,最终让读者读到了这部情感深沉、笔力雄健、语言朴实的报告文学作品。

在作家笔下,雷烨形象有血有肉、内涵丰盈。他早年在浙江金华读书时就是一个进步青年,后只身前往抗战圣地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坚定了革命理想,打造了坚强的意志,培育了战士的品格,很快就成为出类拔萃的积极分子”。就在这个时期,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自己多年的愿望。作品写道:“抗大的人都知道有一位优秀青年叫雷烨,他虚心好学,平易近人,而且很有文学天赋,会写诗、写文章,还会摄影。在抗大这个大家庭里,他如鱼得水,聪明才智很快得到发挥。”抗大毕业后,他主动要求到抗战“最危险、最险恶、最艰苦”的华北前线当记者,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用摄影报道战地实况。在他并不算长的记者生涯中,最重要的报道就是“潘家峪大惨案”。1941年1月25日,侵华日军出动3000多人,包围了抗日堡垒村,“用机枪扫射、刺刀挑战、手榴弹炸、纵火焚烧”等残忍手段,毁灭了和平村庄,屠杀了1230名平民,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潘家峪大惨案”。雷烨第一个赶到现场,第一个发出报道,他忍着巨大的愤怒和悲痛,用图片和文字纪录事件真相,揭露侵华日军灭绝人性、令人发指的罪行,告诉世界,中国人民不会屈服,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尔后,他又辗转根据地的前线后方,写了大量的新闻、报告文学,拍摄了大量的新闻图片。他的图片报道已经成为中国新闻史的重要资料,他的代表性作品,也成为中国摄影艺术史的经典。在冀中,他结识了沙飞、邓拓、田间、魏巍、田华等新闻和文艺工作者,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与他们共同开辟了根据地文化建设的大好局面。因此,他的牺牲,不仅“损失了一名优秀的青年干部”,也损失了一名难得的革命文化人才。

报告文学《远方的“雷烨树”》深入描写战争的残酷和战时生活的艰苦恶劣,构成典型的环境,从中清晰地梳理出英雄成长的历程,一点一滴衬托出了雷烨的时代英雄形象: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他是一个不畏艰难的人,他是一个乐观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忠诚的战士,一个为了民族解放勇于献出自己生命的人。这种崇高感,一直贯穿于作品中,形成



作品悲情壮美的基调,也使人物形象挺立在时代精神的思想高地上。主人公的真名叫项俊文,“雷烨”是他到延安后的名字。而把这两个名字重新合在一起,让一个人的身世大白,竟用了整整60年的时间。这段带有悲情意味的历史叙述,进一步加深了《远方的“雷烨树”》“寻找”主题的厚重感,延伸出作品下半部内容——寻找英雄的故乡,把英雄的灵魂带回家。两个部分融为一体,完成了真正的“寻找”主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浴血奋战的英雄们陆续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而远在浙江金华的项家弟妹们却一直没有等到哥哥项俊文的回来。他自1938年离家后,从武汉寄回一封署名“雷雨”的家书,从此失去音讯。如今,革命胜利了,哥哥却生死未卜。请求有关部门的帮助,也仍然未果。弟弟项秀文长大成人后,承担起寻找哥哥项俊文的任务。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6年,项秀文在一次全国性的地方志编纂会议上,认识了河北省地方志专家高永祯,事情才有了转机。

作品里的高永祯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河北省是当年抗日斗争最残酷的地区,牺牲也最大,许多烈士埋在陵园里,仍然不知故乡在何处。所以高永祯深知让英雄回家的意义,也深知其中难度。尽管资料手里很少,但他还是默默承担起责任。15年的不停调研走访,多次中断线索,又多次找到新的线索,靠着高永祯的执着,经过了许多曲折坎坷,终于把断了的线索接上了。在他的努力下,各方资料不断补充进来,不断修正方向。项俊文与雷烨这两个名字不断靠近,历史之谜一步一步揭开。最终,经过专家严格甄别考证,可以判定,项俊文就是当年牺牲的战地记者雷烨。几十年了,英雄的魂魄终可以回到故里。15年不停止的寻找,高永祯功不可没。

作品看似冷静叙述,其实作家的情感和思想在深层中运行,提醒着读者,高永祯15年“寻找”的意义超越了“寻找”本身。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不能没有自己的英雄,不能没有自己的英雄价值观。人民不会忘记民族的英雄,国家不会忘记民族的英雄。高永祯捍卫了人民英雄,也捍卫了我们时代英雄的理念。

人民不会忘记民族的英雄,国家不会忘记民族的英雄。报告文学《远方的“雷烨树”》深入描写战争的残酷和战时生活的艰苦恶劣,构成典型的环境,从中清晰地梳理出英雄成长的历程,一点一滴衬托出了雷烨的时代英雄形象,以一部讴歌英雄的优秀作品纪念中华民族解放的雄壮历史。



挺进东北 雷 烨 摄

还有多少英雄烈士在等待着回家?也许无法确知,但令人欣慰的是,“寻找英雄”“迎英雄回家”已经上升为社会行动、公民责任,成为国家红色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强化了社会组织措施,而且完善了国家法律保障。只要还有一个人没有回家,社会行动就不会中止。整个社会将越来越深刻认识到,越是走向现代化,越是先进文明,越需要尊重国家民族的历史,越需要敬畏国家民族英雄。崇敬英雄应该成为国家进步文明的道德标志。《远方的“雷烨树”》的英雄观,合乎历史精神,合乎时代精神,是值得一读再读的好作品。

(作者系评论家、作家出版社原总编辑)



创作随笔

自6岁失聪,我在寂静无声的世界里生活了30年。因为几乎听不见,所以我到了24岁才开始练习说话。因此,我对“寂静”的体认早已超越感官缺失的生理层面,演变为一种独特的认知范式。当助听器的电流声在耳骨内制造着失真的声响,当读唇术将他人的话语转译为视觉符号的拼贴,我逐渐意识到,所谓“失聪”并非感知世界的障碍,而是重构诗性经验的契机。

生活的经验告诉我,听觉与语觉缺失,我还有视觉和触觉。生活也告诉我,声音不一定来自有声的世界,它或许存在于更多的无声领域。文明的回响,并非全以喧嚣的声波为媒介,它是在时间深处沉淀的纹理,或是在空间里凝结的符号,或是在心灵间震颤的意象,或是于无声处鼓荡着更为深邃的共鸣……当寂静产生回响时,我的身体就是接收到的共鸣箱。

传统诗学对韵律、节奏、声调的痴迷,构建了一套以声音为核心的审美体系。但在我创作场域里,我被迫将文字从声音的世界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视觉与触觉等感官系统的复合产物。每个汉字都是一个生动的手势,在视网膜上投射出飞舞的光影;每段诗行都是一次肢体的震颤,通过指尖的触摸传递到神经末梢……这种多感官通用的写作策略,让我得以在无声的世界里重构诗歌的物质性——那些在有声语言中被忽略的笔画肌理、排版节奏、空间张力,在寂静的凝视中显露出前所未有的诗的可能。

我的“聆听”始于眼睛的观察,也始于双手的触摸。我看见雨滴在玻璃上写下的象形文字,触摸到秋风在树木间传递的年轮与经脉密码,闻到阳光在空气中静静地蒸发的盐分与甜蜜……在我眼里,声音可以是香喷喷的,也可以是五角星形状的;声音是想象中的感知,是喧嚣之后的空谷回响。我在生活中获得了很多新鲜的灵感。我拒绝将失聪视为需要克服的缺陷,而是将其转化为创作的认知装置。就像盲人通过听觉构建空间图像,我通过视觉与触觉的交织编织语言的经纬。

失聪失语迫使我自己接纳自己,深入自己,深入语言的内核,在词语的幽谷中寻找意象的宝石。寂静迫使我要剥离语言的表皮,直抵其承载的原始意象力量,让不同文明的精魂在我的诗行中进行无声的对话与共振。常人可能沉迷于听觉的盛宴,我却在自己的寂静与他人的喧嚣间隙捕捉到生活的微表情:婴儿第一次触摸花瓣时的指节颤动,游客凝视街景与火车呼啸而过时睫毛的细微抽搐,雪花融化在窗台时的分子重组,火车疾驰大地时无声的痛哭……这些被声音掩盖的生命细节,在我的诗中凝结成琥珀般的意象。我拒绝廉价的抒情,而是用显微镜般的精准去呈现生活的心跳——那些在有声世界里稍纵即逝的瞬间,在寂静的注视下获得了声音的温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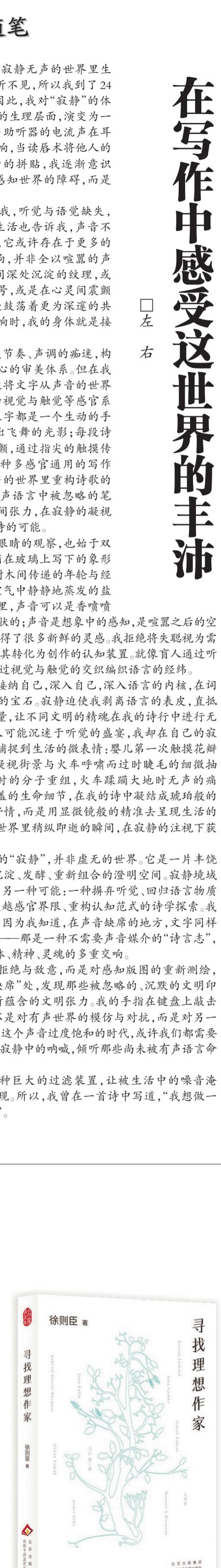
失聪失语所赋予的“寂静”,并非虚无的世界。它是一片丰饶的沃土,是思想得以沉淀、发酵、重新组合的澄清空间。寂静境域中的创作实践,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一种摒弃听觉、回归语言物质性的写作路径,一种超越感官界限、重构认知范式的诗学探索。我不抱怨命运的不公,因为我知道,在声音缺席的地方,文字同样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那是一种不需要声音媒介的“诗言志”,一种在寂静深处的肉体、精神、灵魂的多重交响。

这并非对声音的拒绝与敌意,而是对感知版图的重新测绘,邀请读者在声音的“缺席”处,发现那些被忽略的、沉默的文明印记,体会“大音希声”所蕴含的文明张力。我的手指在键盘上敲击出无声的诗行。它们不是对有声世界的模仿与对抗,而是对另一种诗性存在的证言。在这个声音过度饱和的时代,或许我们都需要学会倾听,倾听灵魂在寂静中的呐喊,倾听那些尚未被有声语言命名的生命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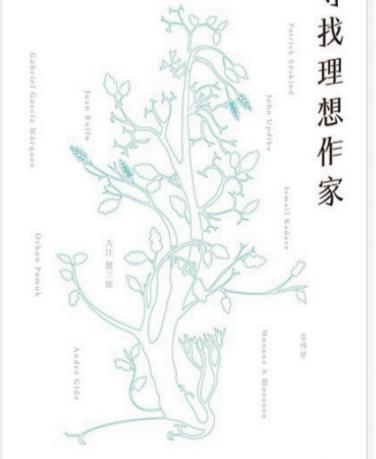
寂静无声恰似一种巨大的过滤装置,让被生活中的噪音淹没的文明纤维清晰浮现。所以,我曾在一首诗中写道,“我想做一个能听见声音的聋子”。

(作者系诗人)

在写作中感受这世界的丰沛

□左
右

徐则臣 著



《寻找理想作家》,徐则臣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4年9月

■评 论

从“到世界去”至“在世界中”

——评徐则臣散文集《寻找理想作家》

□施 展

《寻找理想作家》从读者视角出发,一面阅读经典作品,一面寻找理想作家,时时观照文学与人生、心灵、社会和时代的繁复关联。全书一方面以宏观视野谈论中国与世界文坛的优秀作家和经典作品的话题现象,另一方面从微观视角予以作家作品论式的品评解读。作家以小观大、举重若轻,既辨识出文学在常与变之间的发展线索,也讲述故事,摹写人性,进而抵达时代与世界的独特魅力,并为作家与理想的辩证关系持续扩充、赋予崭新的当代意义。

从阅读到创作,从作家到作品,从传统到现代,从中国到世界,在全书展开如上四维的共时性对话中,作家于阅读感悟中穿插阐释文学之所以触动心灵的真相、作家之所以讲述时代的要义。本书开篇之作《我的“外国文学”之路》中,徐则臣回顾自身与外国文学的相遇历程,以自身的生命经验与心路历程,阐释小说意涵与阅历感悟的有机连锁。《从一个蛋开始》以时隔经年的重读,体认出一个人唯有在脆弱、沉默和无力的时刻,才真正读懂了卡夫卡和他的人物。《只有一个马尔克斯》从跨文化传播角度,综论马尔克斯成为世界级典范作家的影响力

与唯一性从何而来,以及《百年孤独》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数代中国作家的文学启蒙与创作影响。

徐则臣对文学创作和时代浪潮的复杂关联深有体会。在他看来,如果以中国文论的“文以载道”作比,那么在当今“一个必须开眼看世界的时代,一个必须深入地自我反思和发现的时代,世俗层面上的故事,人心之外的故事,已经没有能力及物、有效地接近和抵达我们以及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的真相”。要言之,“文”承载的不只是作家心智和审美境界,还不乏从心灵深度来揭示世界真相的“道”。基于对当代中国的观察和理解,《寻找卡达莱》一文推荐了库切、唐·德里罗和卡达莱的小说作品,深度揭示了这三位作家及其作品,因何能为当代的中国作家贡献“诸多切近的文学启发”。库切“从个体小切口进入宏大叙事的路径”;唐·德里罗置身于后现代的纽约大都市,以长篇小说《地下世界》完成了对现代社会的反思性书写。但相较两者,卡达莱的优长在于“阿尔巴尼亚历史与社会主义经验的个人化的文学处理”,这一特性恰好与中国作家有类似的历史处境和身份认同。徐则臣重点阐释这些作

品在反映文学、政治与文化关系变化进程的同时,透露出一位作家如何在不同语境下展开创作的历史线索与独到魅力。

如果说阅读是感知世界的途径,那么写作便是建构自我的方法,一以贯之的是文学之路的不懈求索:一位作家关注的不仅是世界自身的变化,也需要时刻留意文学进入世界的方式变化。曾几何时,钱锺书《管锥编》反套《庄子·秋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寓意,以锱铢积累之功融中西文化于一炉,徐则臣《寻找理想作家》创化西方经典叙事学“理想读者”概念,却始终怀有一种“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敬意与温情。这份别样的关怀,不单源自人伦论世的严谨,同时取决于他坦率做出判断的诚恳,以及有心重新探讨并修订观点的真诚。

与本书同名的演讲稿《寻找理想作家》讲述了我们对理想作家的寻找、对当代作家的反思,诚为值得关注的话题。徐则臣眼中,一位理想作家的诞生背后,基本素质不外乎开阔视野、问题意识与渊博学识。这不止有赖于写作意义上的个人才华,更暗示了文学创造的生成、规范与升

华。为此,他在表达对中国文学深切希望的同时,还不忘列举出作者面对写作生涯的关键挑战,作家的成熟需要在小说变化的时代脉络上付诸持久的转化和创新,亦要为文学重新发掘并激活被生活日常与阅读习惯所掩盖的理想精神。

徐则臣回顾、记录并重审中外文学不断变化的历史经验,使人格、写作与作品互为历史的文本或生命的见证。中国文学的未来不只是“到世界去”的单程道,中国文学唯有以立足全球文化场域的“在世界中”姿态,方才有望重新绘制当代文学的发展可能。

历史的视野未必阻断心灵对话的时空,文脉总一以贯之的绵延涌动。徐则臣提醒我们:除了中外之间必要的文化交融与文明互鉴,我们更应关注文学自身与时代发展的关系,古与今的交融、雅与俗的调和、普遍与差异的公约性。无论对理想作家的期望,还是对文学现状的不满,统统可化作“修辞立其诚”的创作自觉。但指引作家在文学之路上前行的明灯,始终是人文的理想与精神的关怀。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